

“文明”与“社会”奠定的历史基调

——略论晚清以降“新名词”的浮现对“中国历史”的重塑

章清

龚自珍所谓“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看法，用于对“史学”发展的解释，大体亦可说对“过去”的认知，代有不同。¹晚清士人普遍感受到“三千年以来所未有之变局”，相应的也推动着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对此不仅有诸多分歧，还产生着持续的影响。20世纪20-30年代围绕中国社会性质所发生的论辩，就透露出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的认知，各方存在着严重分歧。耐人寻味的是胡适（1891-1962）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今日中国之危机，正体现在“只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言下之意，“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即属“抽象名词”，用以指称“中国”未必合适。²而正是因为这些字眼世人早已耳熟能详，并广泛用于对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分析，胡适的看法也不免“曲高和寡”。梁漱溟（1893-1988）就明确提出：“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不存在？这已成了今日最热闹的聚讼的问题，论文和专书出了不少，意见尚难归一。先生是喜欢作历史研究的人，对于这问题当有所指示，我们非请教不可”。³梁所质疑的，正道出问题的关键：对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把握早已不同于过往，并难以摆脱上述“新名词”。

此亦正是本文试图略加申论的问题：“新名词”如何重塑了“中国历史”？此一过程如何发生？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尤其是所带来的问题应该如何看待？

“新名词”频频出现，成为现代汉语新词，乃自然的语言现象，然而，就“新名词”之“入史”来看，却并不单纯，攸关于以什么方式审视“过去”，并延续历史的“记忆”。带有浓厚“东瀛”色彩的汉语新词在晚清的出现，原本即引发激烈的争辩；进入到“历史”书写中，更不免产生诸多分歧，毕竟“历史”之意义在晚清颇不寻常。⁴对此，研究者基于“封

1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4-5。

2 胡适对于时人早已惯用的指称中国的“符号”，均指出有不妥之处：“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只有几个小富人；“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势力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见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期，1929年12月10日，页4。1930年7月29日，胡适还写了一封措词颇为严厉的信给《教育杂志》的编辑，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并不是很简单的。一班浑人专爱用几个名词来变把戏，来欺骗世人，这不是小事，故我忍不住要指出他们的荒谬”。此亦表明，胡适撰写此文是有感于当时普遍存在的风气。见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685。相关的讨论参见潘光哲《“封建”与“Feudalism”的相遇：“概念变迁”和“翻译政治”的初步历史考察》，收入叶文宪、聂长顺主编《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页104-32。

3 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新月》第3卷第1号，1930年3月10日，页10。

4 研究者已撰文论述在近代中国“国族”建构过程中，可以从晚清最后十年间大量涌现的“民族英雄”的历史书写，明白窥见“神话历史”或“历史意识形态”的运作。见沈松桥《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页81-149。笔者对此也有所讨论，参见拙文《“历史的意义”：略论晚清中国对“历史”的认知和阅读》，待刊。

建”、“文明”等话语之“入史”已有所讨论⁵。我想强调的是，“新名词”构成重塑“中国历史”的基调，所呈现的是整个“话语”的转向，乃中国纳入“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产物。值得重视的还在于，重塑“历史”的这些“新名词”，在学科归类上未必会划分到历史学科中，这样问题又与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结合在一起。正是因为对“中国历史”的重塑牵扯许多复杂因素，因此也有必要将此纳入中西历史的“会通”，尤其是20世纪初年中国所催生的“新史学”这样的背景中予以审视。换言之，将“新名词”与“中国历史”的重塑结合起来，乃是期望从新的角度对此有所申论，重要的不是“新名词”进入到历史书写中（这样的问题绝非一篇短文所能展开），而是关注“文明”与“社会”这些因素的浮现如何影响到历史学科的成长，并因此改变了中国对于“过去”的认知。

一、“新名词”之“入史”——“文明”与“教化”的视野

“历史沉淀于特点概念”，论者引述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鞍型期”的理论就揭示了，语言所展示的概念转换，并不只具有表象的意味，还构成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相应的借助于被考察的“概念”，可以重构社会历史色彩缤纷的截面并以此呈现整个社会历史⁷。针对汉语新词进行“历史语义学”（“概念史”）的分析，近些年中国学界也有不少尝试；结合“文本”与“语境”开展“概念”的分析，也渐渐在形成一些共识。重要的是，“语义”分析的基础乃语言本身，而语言现象往往与思想文化的进程有着密切关联。若说“概念”于西方世界成为现代世界诞生的征象，则近代中国出现的诸多概念也构成“转型”的象征。

实际上，晚清中国频频出现汉语新词，也大致可归于来华西人“援西入中”的产物。当两种文化的沟通依托于“出版物”展开，在译书活动中广泛采用“新名词”，也难以避免。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1904年在一篇文章中就说明：

中国今日于译书之中，苦名词之枯窘而借日本所已译者用之，正如英文借德文、法文之比例。且日本之文原祖中国，其译书则先于中国。彼等已几费酌度，而后定此新名词，劳逸之分，亦已悬殊，何乐而不为乎？

尤其还说明，“在未教化之国，欲译有文明教化国人所著之书，万万不能。以其自有之

5 关于“文明”的讨论，参见方维规《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史林》1999年第4期，页69-83；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页1-34。关于“封建”，除前揭潘光哲的文章，还可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6 有关中西历史之“会通”以及“普遍历史”观念对中国历史书写的影响，笔者在其他文字中已有所讨论。参见章清《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页75-95；《“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236-64。因问题的相关性，上述文章所引证的一些资料与例证，在本文中也有涉及。

7 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页3-20；《“鞍型期”与概念史——兼论东亚转型期概念研究》，《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期，台湾政治大学2011年12月，页85-116。

言语，与其思想，皆太单简也”。具体到中国，尽管中国之文化“开辟最早”，然而“至今日而译书仍不免有窒碍者”。别的且不论，“中国之字不过六万有奇，是较少于英文十四万”，因此“译书者适遇中国字繁富之一部分，或能敷用，偶有中国人素所未有之思想，其部分内之字必大缺乏，无从移译”，由此“新名词不能不撰”⁸。审视“新名词”之“入史”，也当紧扣晚清以降中西史学“会通”背景下史学观念发生的转变，正是立足于“文明”与“教化”的视野对“历史”重新审视，才催生通过源自“西洋”、“东洋”的“新名词”重新认识历史。

可以明确的是，“新名词”的出现往往是寻求对“他者”恰当的表述，与理解另一种“文化”息息相关，因此，最初常常是以“音译词”的方式表现出来。当然，立足“自我”想象“他者”的历史，将“西史”纳入“中史”的架构中进行认识，并且袭用中国本土的“语词”描绘“西史”，也曾是晚清士人常常使用的方式。《四洲志》、《海国四说》、《瀛环志略》、《海国图志》等通常被视作中国士人认知世界所产生的最早一批著述，即体现出这一特点，往往基于中国的历史纪年，将“西史”纳入其中予以把握。由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编译的《欧洲史略》，还借助了不少中国的“话语”，如描绘到欧洲起源就说明：

希腊一国，实为之始。即后此诸国，率各纪有正史，以备载其国之君政民风，亦实由希腊创立民主国时，有数大著名人作诸民史，为之作俑，是今欧洲人民所遵六艺以及格致等学，始皆创自希腊。¹⁰

“正史”、“六艺”之类，即是中国“话语”投射到“西史”的直接体现。而且，这往往与捍卫自身悠久的历史相关，“西学中源”见解的流行，其要旨也体现于此，“教化”即构成“中史”投射于“西史”的关键词。郭嵩焘（1818-91）作为中华帝国派出与西方世界接触的第一位正式代表，即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¹¹。

8 林乐知著、范祎述：《新名词之辨惑》，《万国公报》第184册，1904年5月，“译谭随笔”，页23-24。

9 徐继畲（1795-1873）《瀛环志略》在描绘“欧罗巴”时（具体到国家亦然），即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其历史，“其地自夏以前，土人游猎为生，食肉寝皮，如北方蒙古之俗。有夏中叶，希腊各国，初被东方之化，耕田造器，百务乃兴。汉初，意大利亚之罗马国，创业垂统，疆土四闢，成泰西一统之势，汉史所谓大秦国也。前五代之末，罗马衰乱，欧罗巴遂散为战国。唐宋之间，西域回部方强，时侵扰欧罗巴，诸国苍黄自救，奔命不暇”。见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四，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重印本，页293-94。夏燮（1800-75）《中西纪事》，也依据中国纪年勾画出西方社会之演进，“考其分合之由，则自汉以前，皆统于额力西（即今之希腊）。至东汉时，罗马浸强，即今之意大利亚国，并吞各部，历四百年纲纪西洋一统最久。六朝之际，罗马衰微，为北狄峨特（即哥德人）之族所侵，分裂其地，于是各部自王，部相统摄。惟共奉一教主，而其教皇世居意大利亚国中，凡大西洋受封废立之事，皆请命焉，然不能执予夺之权也”。见夏燮《中西纪事》卷一“通番之始”，高鸿志点校，湖南岳麓书社1988年，页2。

10 艾约瑟编译：《欧洲史略》，“西学启蒙十六种”之一种，总税务司1886年，页6。

11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湖南岳麓书社1984年，页491。用不着特别指明，两种不同的历史书写方式的对话，是双向的过程。参见安田朴（Rene Etiemble）著《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页668-69；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著《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页214。

正是郭嵩焘，在描绘西史、中史时，其所使用的“新名词”，也颇为引人瞩目。只不过郭氏不懂英语，全凭翻译传递信息，往往以“音译”方式进行表述。在一则日记中郭就写道：

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里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¹²

这里所呈现的，正是诸多以“音译”方式表示的“新名词”，“色维来意斯得”与“巴尔比里安”，分别对应于今日通行之“文明”（civilized）与“野蛮”（barbarian）之译名。当然，使用“音译词”不仅与掌握语言的能力有关，更与对“外来词”的“理解”相关——能否找到恰当的对应词或创出合适的“新词”。即使以翻译享誉的严复（1854-1921），也曾使用不少“音译词”。如在《原富》中针对“corporation”的翻译，即显示出由于中西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要寻找合适的语词加以说明，翻译者不得不费尽心机。严复在所加按语中就这样写道：

此所谓联，西名歌颇鲁勒究。犹中国之云会，云行，云帮，云党。欧俗凡集多人，同为一业一事一学者，多相为联。然与中国所谓会、行、帮、党，有大不同者。盖众而成联，则必经议院国王所册立，有应得之权，应收之利，应有之责，应行之事，四者缺一，不成为联。

所谓“歌颇鲁勒究”，即系“corporation”的“音译”，今译作公司、社团、法人等，乃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之一。之所以选择“音译”，乃是因为严清楚感受到中西之间的差异突出表现在欧西社会“同为一业一事一学者，多相为联”，中国与之相关的所谓会、行、帮、党，“有大不同者”¹³。这也表明从事翻译工作时，严复不得不面对“社会”如何构成的问题。他所面对的是西方架构下的社会分层（体现在与国家分权的社会组织），但在中国，即便同样有帮、有会，却与之大异其趣。

无论是郭嵩焘观察到的欧洲之视中国“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还是严复觉察到的中西之间“有大不同者”，皆揭示出“新名词”之“入史”，与中西历史之“会通”有关，并且是在中国纳入“普遍历史”的背景下。由于中西之间强弱对比已发生变化，相应的，重新定位“历史”，并立足于“文明”与“教化”的维度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也成为“新名词”涌现的关键所在，因为不少“新名词”往往与对“文明”发展程度的认识相关。¹⁴

12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页491。

13 《原富》“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页864-65。1897年严复就着手翻译此书，到1900年全部脱稿，1901-02年全书陆续由张元济主持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

14 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收入氏著《国史探微》，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页1-19。可略加补充的是，此前中国在历史书写中也曾守望于此。书写周边民族乃至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也算得上中国史书的一个传统。除依从中国之纪年方式，也衍生出对文明发展程度的考虑。《隋书·经籍志》就表示，“夏官职方，掌天下之图地，辨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狄之人，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国，使其同贯”（《隋书·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页987）。意味着面对不同的民族

传教士之“援西入中”，重要的一环即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历史，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97）作为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中国经典的翻译者与阐释者，之所以动摇了“过去由耶稣会士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有关中国经典和儒家学说的那些老生常谈式的说法”，关键即在于将中国列入“人的普遍历史”之中¹⁵。而对“西史”的介绍，则体现在向中文世界揭示出另一种“历史”。既然这一工作主要由传教士担当，所呈现的世界历史图景不免含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致力于将人类历史纳入“普遍历史”的模式中¹⁶。将历史演化定位于不同“阶段”，乃至古、中、近三个时代，即体现出这样的视野。较早介绍西方史学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在《大英国志》“凡例”中即将天下万国之“立国之道”区分为三，将中国定位于“礼乐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贱不治贵”。只是还未将此与另外二种政体作高下之分¹⁷。1882年出版的谢卫楼（Devello Zololos Sheffield, 1841-1913）编译的《万国通鉴》，于此却呈现出别样的情形。该书计分四卷，分别为“东方国度”、“西方古世代”、“西方中世代”、“西方近世代”。单就卷次的安排来说，就不难察觉出对历史富于深意的理解。“东方国度”只一卷，没有像书写西方历史那样区分三个“世代”，便大有意味。固可说对“东方国度”的书写，一向没有据此进行区分（稍后才照此划分），然而，这其中未尝没有“东方国度”还没有发展到“近世代”的意识。实际上，该书也固守西方各国走在历史进程前列的立场：“东方之国虽有正道，亦多兴起异端，甚有以主道为虚，自甘废弃，以异端为实，至今奉崇。”因此，“平心比拟，则西方各国，实有数事愈于东方焉”¹⁸。

“世代”划分之外，更突出的是强化对历史的二元认识，“文明”与“教化”也渐渐构成划分历史的准则。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所译《佐治刍言》，对世间事物的描述，即明显在古代与现代之间划分出“黑暗”与“光明”来；也展现出对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认知：“考各国史书，则知各国政事，已有蒸蒸日上之势，其间或行而辄止，或进而复退，不

与文化，往往立足中国文明之“普世性”加以审视。相应的，“中华”与“夷狄”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也纳入中国史家的视野。如杜佑《通典》已有“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的看法，认为“古之人质朴，中华与夷狄同”，尔后“地中而气正”之中华，“继生圣哲，渐革鄙风”，而“地偏气犷”之四夷诸国，“则多仍旧”（杜佑：《通典》卷四十八，湖南岳麓书社1995年，上册，页704）。

- 15 吉瑞德（Norman J. Girardot）著：《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段怀清、周俐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57。
- 16 所谓“普遍历史”，简言之即是试图将人类历史描绘为一个整体，理解为一致的发展过程。按照克罗齐（B. Croce, 1866-1952）的说法，“普遍史确乎想画出一幅人类所发生过的全部事情的图景，从它在地球上的起源直到此时此刻为止”。在基督教时代，可以印证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在近代，则可以引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见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页39-40。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也强调了，就“普遍历史”在经验上可以理解来说，“只有在关于历史整体是统一的这一思想指引我们时，我们才可能领会普遍历史的意义”。见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页6。关于“普遍历史”这一概念的演变，可参见 Kelly Boyd, ed.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London and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9, pp. 1244-46; Harry Ritter, ed. *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86, pp. 440-45。
- 17 慕维廉：《大英国志》，上海墨海书馆1856年，“凡例”，页1。
- 18 谢卫楼编译：《万国通鉴》卷四下，上海益智书会1882年，页73-79。该书英文序言交代了，是书并非译自一部书，乃依据韦伯（Weber）、威尔逊（Wilson）、斯温顿（Swinton）的“大纲”，罗林森（Rawlinson）和查汉茂（Thalheimer）出版之“手册”，及各种“百科全书”等资料汇编而成。

能直臻上理，然统核前后，总可谓愈进愈上矣”¹⁹。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更是明确传递了“进化论”的思想。原书1889年出版于英国伦敦，正是进化论盛行的年代，也表达了社会不断进步的看法，明确以“古世”、“近代”为尺度，道出中国处于落后位置，指出“中国古世善体天心”，“一日万几，无不求止于至善，是以巍然高出于亚洲为最久之大国，而声名之所洋溢且远及于他洲，猗欤盛哉！”然而，“近代以来良法美意忽焉中收，创为闭关自守之说，绝不愿与外国相往来。……沿至今日，竟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²⁰。林乐知等编译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还以进化论思想批驳循环论史观，认为“世运盛衰之说，不足凭也”，“自古以来，论国则有盛有衰，论教化则有进无退。”该书也堪称“万国古今教化论衡”，指明大致可区分“教化”为三等：“最下者为未教化人，其次为有教化人，最上则为文明教化人”²¹。

以“文明”为核心重新认识历史，不可忽略的是日本因素的作用。周予同（1898-1981）曾指出，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时期，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是由日本间接输入的，“这类书影响于中国史学界较早而较大的，大概是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鹭藏《中等东洋史》两书；更其是前者，因为用汉文写作的关系，影响更大”²²。具体到史学书写样式，梁启超（1873-1929）《西学书目表》史学部分列为首篇的冈本监辅（1839-1905）著《万国史记》，也值得重视。该书“凡例”强调了：“文虽用汉字，其体反仿泰西史例”。冈千仞（1833-1914）在《序》中还说明，西史分称三古——上古、中古、近古，不独是“明古今明暗之别也”，同时这样的“世运岁进”，也是万国常态，“与地球始终者矣”²³。不仅将欧洲历史理解为依次进化的不同阶段，同时也试图将东洋纳入这一模式，指出东洋之发展尚停留在西洋之中古时期。

来自日本的著作之所以在晚清颇为流行，原因正如同张之洞（1837-1909）的认知，敬

19 傅兰雅译，应祖锡述：《佐治刍言》，上海江南制造局1885年，页42-43。

20 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泰西新史揽要》，上海广学会1895年，“译本序”，页1。

21 林乐知等编译：《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第6集下卷，上海广学会1903年，页73。

22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535。究竟哪部书影响更大，或见仁见智，陈庆年就更为肯定桑原鹭藏之书产生的广泛影响：“桑原鹭藏《东洋史》自樊炳清译本出于东文学社，其书盛行，殆遍于东南诸省，庆年在武昌时见诸校印者已有数本，盖自己亥以来四五年间以此为教者相属也，顾其为书世界史之例耳，而于国史所应详者，尚多疏略”。进一步还阐明其编写的教科书，即“略依桑原篇题，补集事实，以为此编”。见陈庆年编纂《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后序”，页1。

23 冈本监辅著，中村正直译：《万国史记》，上海申报馆1879年，“凡例”，页1；“序”，页5。

24 张之洞《劝学篇·游学第二》即表示：“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见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9738。陶行知在《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中还具体阐明了中国如何走向效法日本之路：“甲午战败之后，大家以兴学为急务。此时热心兴学的人，对于从前之偏重西文，颇不满意，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当时最有势力的反动。那时虽为日本打败，但却不佩服日本。孙家鼐说：‘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故看二十四年的学堂章程，日本教育的势力还未侵入。但日本之所以强，究竟不能不加以注意，渐渐的就有人到日本去考察。日本离中国近，仿效日本，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后来加以庚子失败的激励，更觉得兴学为救国要图，不容稍缓。但拟订学制，自然要参考各国的成法。日本学制，因那时国情及文字关系，最易仿行，故光绪二十八年的学制，特受日本学制的影。张百熙的奏章，虽说他曾参考各国的学制，但除日本的外，他对于那时各国

业学社 1902 年出版的《欧洲历史揽要》，则具体说明了“历史”方面的情况：“泰西可译之书多矣，而史为要，史不胜译矣，而以日东名士所译之史为尤要。盖泰西上古、中古、近古数千年来盛衰兴亡之理，史皆具焉。日本与吾国近，自明治维新汲汲之以译书为事，所译以历史为多，且其书皆足以以为吾国鉴戒，故译史尤以日本所译之史为尤要”²⁵。1905 年《万国公报》刊登的一篇演说稿，还提到这样的情况：

日人之在华不但充当教习，亦多取东文之书翻成中文；近数年来由东文译成华文之教科书，从蒙学课本至格致、历史、理学等书为止，皆在上海日人所设之书店出售。²⁶

不过，来自日本的著述，无论是用汉文写作，还是翻译的著作，采集颇广，还难以说明语词的来源。²⁷重要的是，既然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方式与书写形式业已改变，则按照新的术语进行阐述，再自然不过。论者揭示出，对明治时期的知识人来说，文明史观呈现的“文明（开化）／野蛮”、“进步／停滞”的二元认识，既是认识西洋世界、确定日本以欧美为典范的“文明开化”的指针，也是重新认识中国的坐标轴。所书写的“支那史”，“正是欧洲文明史教科书影响下重新书写中国历史的产物”²⁸。那珂通世（1851-1908）所著《支那通史》，于此即有充分体现，并使用了不少“和制汉语”。中村正直（1832-91）所纂《序》开篇即云：“四书五经者，支那之精神命脉者”。又表示：“窃以为海内士子，有甲乙二种，甲为专门学科之士，乙为随意学问之士”²⁹。立足“文明”与“开化”书写历史，也成为该书的选择。“叙言”说明是书重点“叙历代治乱分合之概略，庶几初学之徒，或得由以察我邻邦开化之大势也”，用到“文化”一词：“秦汉以下，二千余年，历朝政俗，殆皆一样，文化凝滞，不复进动，徒反复朝家之废兴而已”。卷一“总论”又涉及到“文明”：“国人自称曰中国，盖以为居天下之中也；又曰中华，或曰华夏，犹言文明之邦也。此皆对夷狄之称，而非国名也”³⁰。“精神”、“学科”、“开化”、“文化”、“文明”等语词，不少即可归为“和制汉语”³¹。在为桑原鹭藏（1871-1931）《中等东洋史》所撰“序”中，那珂通世又特别指出东洋

的学制所说的话，简直是没有根据。二十九年学制，对于日本学制，更加抄得完备，虽修改七次，终少独立精神”。见陶行知《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新教育》第 4 卷第 2 期，1922 年 1 月，页 240-59。

25 长谷川诚也著，长水敬业学社译：《欧洲历史揽要》，东京敬业学社 1902 年，“序”，页 1。

26 哈拉达：《论日本在华之教育势力》，林乐知译，任保罗述，《万国公报》第 201 册，1905 年 10 月，“论说”，页 12-13。

27 此类用汉文写作的著作，大致都有这样的问题，前面讨论的《万国史记》亦是如此。冈千仞在《序》即说明，该书“辑和汉近人译书数十部”。见冈千仞《万国史记序》，《万国史记》，页 5。

28 黄东兰：《书写中国——明治时期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中国叙述》，见黄东兰主编《新史学》第 4 卷，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页 130。

29 中村正直：《支那通史序》，见那珂通世著《支那通史》，日本中央堂 1890 年，页 1-2。

30 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叙言”，页 6；卷一，页 1。

31 除“精神”出自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五车韵府》，其余的皆可归于“和制汉语”。见 R.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Macao, China: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此据上海点石斋 1879 年石印本，p. 160。关于“和制汉语”，可参见沈国威《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东京笠间书院 1994 年（2008 年改订新版）；荒川清秀《近代日中语汇用語の形成と伝播》，东京白帝社 1997 年；陈力卫《和製漢語の形成と展開》，东京汲古书院 2001 年等。

“文明”的价值应得到充分重视：

叙述欧洲之治乱兴亡，名之谓世界史与万国史，此一偏之见，非通论也。世界文明，非必尽由欧洲，东洋诸国，社会之勃兴，风气之进化，亦不弱于欧洲。³²

以“文明”为中心书写历史，也成为晚清读书人的选择。1901年蔡元培（1868-1940）在为《选报》所写序中，将“史例”区分为“记注”、“辑比”、“撰述”，为此也指明，所谓“撰述者”，乃“抽理于赅动之总，得间于行墨之外，别识通裁，非文明史不足当之”³³。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介绍西洋历史教科书时，则批评这些书籍“言文明之进步，嫌其不详”，指明“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中国之“文明变迁之迹从未有叙述成史者”³⁴。章太炎（1869-1936）在《馗书·尊史》中也指出：“中夏之典，贵其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³⁵。这也代表着清末历史书写转变的象征。翻译的著作自是不少，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的《西洋文明史之沿革》即阐明：“进步、统一、自由三思想不发达，文明史断无由起，是不待智者而后知矣”³⁷。秦瑞玠（1874-?）编著的《高等小学西洋历史教科书》，也突出了这方面的意思：泰西诸邦，“其立国之久，开化之夙，则自希腊罗马，固已代孕文明，彬彬称盛”，“近世进步顿速，而其力日富，势日强智慧日新，学艺日进，治内之法制日详，对外之政策日狡”。作者所期望的是，“详其历史，告我国民，以策改良而资进化”³⁸。此外，“横阳翼天氏”所作《中国历史》，“总叙”论及“历史之要质”则突出了“竞争”、“进化”等“话语”：

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记，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³⁹

刘师培（1884-1919）《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强调：“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今所编

32 那珂通世：《中等东洋史原序》，见桑原鹭藏著《中等东洋史》，周同愈译，上海文明书局1904年，“原序”，页1。

33 蔡元培：《蔡叙》，《选报》第1期，1901年11月11日，页3。

34 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文集之四”，页82-85。

35 章太炎：《尊史》，见徐复《馗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785。

36 相关研究可参考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收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页95-119。

37 家永丰吉著：《西洋文明史之沿革》，王师尘译，赵必振序，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有关“文明史”著作的翻译介绍，不是这里可以展开的，相关研究可参见李孝迁、林旦旦《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及回应》，《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页83-88。

38 秦瑞玠编著：《高等小学西洋历史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编辑大意”，页1。

39 “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上海东新社1903年，“总叙”。

各课，咸以时代区先后，即偶涉制度文物于分类之中，亦隐寓分时之意，庶观者易于了然⁴⁰。商务印书馆1907年出版的吕瑞廷、赵澄壁等合编《新体本国史》，在“绪论”中还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当下所见之“史书”，“非失之略，即失之浑”，强调“历史”当关注“建国之体制，学术之隆替，武备之张弛，政治之沿革，文明之进步，实业之发达，风俗之变迁”等方面的内容，才能使读者了解“社会之变迁”、“文化之由来”⁴¹。

既以“文明”为中心，也促成历史书写逐步成为认同“普遍价值”的示范，与之相关的“新名词”也不断涌现，构成“话语”的核心。举例来说，在各种历史教科书中，“自由”即作为西方社会演进的重要价值得到肯定。不惟“自由”，实际还包括与之关联的“民权”、“平等”、“主权”、“权利”、“自由主义”等等，“新名词”之“入史”，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⁴²。

中国被纳入“普遍历史”架构，无疑是晚清以降历史观所发生的最为深刻的变化之一，纳入“普遍历史”，不只具有时间的意义，还包括价值的取舍。“新名词”之“入史”，往往即体现为对西方近代知识的接纳。西洋历史著作中充斥着“自由”等“话语”，即显示出是对历史进程新的把握；不惟如此，对于“中国历史”的描绘，也往往依托于这样一些“新词”展开。其原因正在于，凡事求诸于历史，在历史中寻求答案，向为中国士人所乐为⁴³。梁启超对于“革命”话语之流行，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这也推动其开展“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⁴⁴。《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10号刊登的一篇讨论“中国历史”的文章，则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人与事，皆透过各种“新名词”展开，不仅说明“孔子者，吾中国之大政治大哲学家也”，还以此阐述对周末历史的看法。“精神”、“自由”、“神经”、“意识”、“主权”、“脑识”、“进步”、“学界”、“文明”、“发明”等语词，构成解读中国历史的“关键词”，自然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写道：

中国历史之精神最发达者何在？大抵天下事有所制者，必不能自由。吾欲改革吾学术，淬励吾神经，增长吾意识，若犹羁束于数千年至尊无上之主权，则宗派不能立，而天然之理想易窒；不然，或迷信于数千年独一无二之宗教，则脑识为所迁，而学界之进步易阻；或浸淫于旧族之太深，株守数千年老师宿儒之说，则不能组织异议，而文明因之以不生，或吸取他国之新

40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国学保存会1904年，收入《刘申叔遗书》下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凡例”，页2177。

41 吕瑞廷、赵澄壁等合编：《新体本国史》（中学堂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绪论”。

42 这里无法完全展开，相关讨论参见章清《“自由”的界限——“自由”作为学术术语在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的“呈现”》，收入孙江主编《新史学》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页47-75。

43 钱穆晚年讲“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就特别讲到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仅孔子如此，也是中国人做学问的一套主要方式，可称为一种生命学。见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页64。余英时论及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时，也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哲学的突破”是以“王官之学”为背景，而且“突破”的方式又复极为温和，往往是诸家论“道”皆“托古”以争正统，都强调其历史性，即与以往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46-47。

44 中国之新民：《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第46、47、48号合刊，1904年2月14日，页115。

语，而尽弃数千年先哲大师之学，则甘为外人奴隶。而古义无所发明之数端，实为古今之时势所趋。生此间者，必不能脱此等种种魔障。然而吾中国诸大家，适生于有周之末，幸无此等种种魔障。即有此魔障，而能出其所学以推荡而廓清之，所为能铸造此学派，而为中国历史上放大异彩，是即中国历史精神之发达也。⁴⁵

征诸各种以“中国历史”为题名的书籍，也显示出同样的特点。1903年出版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其“弁言”开篇即写道：“恫哉，我国无史，恫哉，我国无史”，说明该书“据东士市村氏泷川氏所为《支那史》者，去吾二十四姓家乘所备载之事实，而取其关于文明之进步者，断自上古以逮。于兹删其芜，补其阙，正其误，译以饷我无史之士夫”。既然重点落在“文明史”，相应的每章所写的具体内容，均按照制度、学术、宗教、技艺、产业、风俗展开。⁴⁶前面提到的“横阳翼天氏”所作《中国历史》一书，亦体现出这样的诉求，在《中国历史出世辞》中作者就直言：“中国有历史乎？何配谭有中国历史乎？余一人朕天子之世系谱，车载斗量；而中国历代社会文明史，归无何有之乡。飞将军、大元帅之相斫书，汗牛充栋；而中国历代国民进步史，在乌有子之数”。为此也强调是书之作，“译述中国历代同体体养息活动进化之历史，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⁴⁷所谓“社会文明史”、“国民进步史”，就构成中国历史新的“基调”。夏曾佑（1863-1924）《中国历史教科书》总结“古今世变之大概”，“文化”、“宗教”、“社会”之类的字眼也构成“关键词”。⁴⁸各种历史书籍中充斥着这样一些“新词”，也意味着书写历史在话语上的转变，并因此改变了历史的基调。所谓“重塑历史”，即体现在对历史的重新认识中。⁴⁹

二、以“社会”为核心的“新名词”

针对某一学科“新名词”展开的调查，往往依托于各种字典、辞书进行，然而，与“历史”相关的“新名词”，却呈现出不一样的情形。在各种字书、词典中，或许难以发现标明为“历史类”的“新词”，这种“异象”正大可玩味，显示出“新名词”之“入史”另有枢机。以“文明”为核心揭示历史之变迁，固是晚清以降史学发生转变的重要方向，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伴随“社会”的成长，对“历史”认知较之以往也大异其趣。这里的关键是，逐

45 高步云：《论周末诸大家学派与中国历史之关系》，《新世界学报》第10号（癸卯第1期），1903年2月12日，页33-34。

46 支那少年编译：《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上海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弁言”。某些朝代不包含“宗教”、“风俗”、“产业”等内容。

47 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出世辞》，《政艺通报》第2年第9号，1903年6月10日，“政史文编”，页13-14。

48 此外，也使用各种“新词”书写历史。如对巴比伦就有这样的叙述：“巴比伦女子可受父母之遗产，在公庭父子平权，奴隶亦有财产与讼狱之权。……商法甚详，教育普及，女子亦讲学问，邮信极多……人皆平等自由”。见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最新中学教科书）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年，页5。

49 这是认同这些价值的体现，相应的在其他教科书中也有所体现。中华出版的“修身教科书”便指出：“本书以养成中华共和国完全国民为宗旨。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为经；以公德、私德、国民科为纬”。“国文教科书”也有相似的“宗旨”：“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为经；以生活上必须之知识为纬”。见《中华书局宣言书》，《中华教育界》第1年第1号，1912年1月25日，告白页。

渐成形的分科知识成为书写历史新的“资源”，影响所及，不仅“新史学”的成长受此主导，“新名词”之“入史”，也由此体现出来。换言之，各种字书、词典中鲜少标明为“历史类”的“新词”，并不能说明“历史学科”的新词不多，不宁唯是，反倒说明由于与“他学”紧密结合，其他学科之术语广泛进入到历史书写中，成为“新名词”滥觞的显著特征。

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虽未专门列出“历史”方面的名词，却有不少与“历史”相关，如“释政”、“释法”、“释教育”、“释群”等篇章中，即列出不少与“国家”、“社会”相关的“新名词”，实际成为书写历史的主要语词。“释国家之起源”就写道：“研究人类社会之历史，而推论国家之所以成立者，谓之国家起源说”⁵⁰。黄摩西（1866-1913）所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对于“历史”方面的语词较少搜集即有所说明：“本书搜辑一切学语、调查种种专门学书籍为基础，中外兼赅，百科并蓄，以适用于教员考检学子自修为宗旨”。还指出：

吾国原有词类，即历史一门，浩如恒沙，且学界诸君，旧学必多根底，否则类是种种，取之即是，毋烦河头卖水也。故本书于本国学术词类，仅采大纲，家派源流，同条共贯，不一一另立。⁵¹

从该书标识为“史”的语词来看，主要是人名、地名之类，也包括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没有多少“新词”，用以揭示社会发展状态的只有“近世”一词。尽管“史学”部分所收“新词”不多，但不难发现，书写历史的许多“新名词”往往收在别的学科中，如“主权”收于“宪法”类，“社会”收在“社会学”；还列出“通用门”，收有“公理”、“共和政体”、“改良”、“改革”、“国体”、“国家”、“义务”、“权利”等。因此，史学著作中频频出现的“新词”未必会归入“史学”的学科术语中，正说明“新史学”受到“他学”之影响颇为明显，往往体现在借助“他学”的“术语”书写历史。

正是“社会”的成长，影响到历史书写的方向。如王汎森揭示的，“新史学”诞生于19、20世纪之交学术圈围绕“有史”与“无史”争论的背景，而问题之实质，或需援据晚清同时发展的政治概念才能很好把握，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史学传统的国家争论这样的问题，却无疑意味着对历史的理解逸出了传统范畴，重新提出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⁵²有一点是清楚的，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催生，紧扣的是对“史学”新的界说，“社会”即成为核心所在。严复译《群学肄言》即指出前史体例，“于帝王将相之举动，虽小而必书，于国民生计之所关，虽大有不录”。⁵³提出审视过去当关切于“一群强弱治乱盛衰之故”。在

50 汪荣宝、叶澜：《新尔雅》，上海明权社1903年，页4。

51 黄摩西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凡例”，页2。

52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收入《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165-196。瓦格纳也曾论及中国“新史学”的诞生，特别论述了日本因素的重要性。见Rudolf G. Wagner. “Importing a ‘New History’ for New Nation: China 1899.” In Glen Most, ed. *Historization-Historisierung. Aporemata, Kritische Studien zur Philologiegeschichte*, vol. 5.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1, pp. 275-92.

53 斯宾塞著：《群学肄言》，严复译，该书最初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1903年出版，此据北京商务印书馆

“译余赘语”中，还传递出没有“社会”也难以有“国家”的看法：“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⁵⁴。为此严也将“史学”作为“群学”的一部分，在1898年所作之《西学门径功用》即说明：“群学之目，如政治，如刑名，如理财，如史学，皆治事者所当有事者也”⁵⁵。章太炎对此的思考也颇有代表性，指出中国史家各有阙失，实难“当意”：“太史知社会之文明，而于庙堂则疏；孟坚、冲远知庙堂之制度，而于社会则隔；全不具者为承祚，徒知记事；悉具者为渔仲，又多武断”⁵⁶。不难看出，“社会”也成为章思考书写历史之关键所在。

大致说来，对“历史的范围”的重新厘定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的重视。梁启超阐述的“新史学”，究其实质，即是立足此探讨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内中特别提到昔之史家的两项弊端：其一，“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指出“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其二，“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在梁氏看来，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自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⁵⁷。此两点正构成“新史学”关切的要点所在，当“历史之范围”拓展为“全体之史”，所突出的是以“社会”为主轴书写历史，而既以“社会”为中心，则不免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知识以更好认识“社会”。原因无他，在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主导下，“社会”的构成也成为关注的焦点，对此的解释则由不同的分科知识担当。

梁氏这些见解展现出试图在各学科中为“史学”寻求新的定位，这也是当时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陈黻宸（1859-1917）言及史学，即自觉结合其他学科进行界定：“史学者，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一物之始，而必有其理焉；一人之交，而必有其事焉。即物穷理，因人考事，积理为因，积事为果，因果相成，而史乃出。是故史学者，乃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⁵⁸。黄节（1873-1935）在《黄史》中说明“吾四千年史氏有一人之传记，而无社会之历史”，同样突出对“社会”的重视，为此也特别提到新兴学科对于史学大有裨益，“吾以为西方诸国，由历史时代进而为哲学时代，故其人多活泼而尚进取。若其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诸编，有足裨吾史科者尤多”⁵⁹。针对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王国维（1877-1927）还具体阐明研究史学须具备如下学科的基本知识：(1)中国史，(2)东洋史，(3)西洋史，(4)哲学概论，(5)历史哲学，(6)年代学，(7)比较语言学，(8)比较神话学，(9)社会学，(10)人类学，(11)教育学，(12)外国文学。⁶⁰

1981年版，页8。

54 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严复集》第1册，页125-26。

55 严复：《西学门径功用》，《严复集》第1册，页95。

56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八》，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141。内中提及的史家分别是司马迁、班固、孔颖达、陈寿、郑樵诸人。

57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页7。

58 陈黻宸：《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页675。

59 黄节：《黄史·总叙》，《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2月23日，页2-3。

60 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奏定经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

晚清士人针对“史学”与“他学”阐述的这些见解，令人印象深刻。显然，伴随现代学科在中国的成长，“史学”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上海通雅书局1903年编印了《新学书目提要》，卷二之“历史类”便强调“历史一门最切于今日学界，亦莫杂于今日学界”⁶¹。而且问题还不只是“他学”有裨于“史学”，“史学”有功于“他学”，二者之结合尚可产生“他学”之“史”——学科史。陈怀（1877-1922）在《学术思想史之评论》中即有如斯之言：

尝纵观宇宙之大观，翻欧美之载籍，分析其史学之种类，无论为政治，为法律，为宗教，为教育，为经济，为天文，为地理，为格致，为社会中种种现象，莫不有史，而惟学术思想史，为尤精伟哉。⁶²

言下之意，史学该书写什么，也有清楚交代。宋恕（1862-1910）1905年所撰《粹化学堂办法》，就不仅在课程安排上突出史学的重要性，还明确表示，“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有一史必有一史之学，数万里之原案咸被调查，数千年之各断悉加研究，史学极盛，而经、子、集中之精理名言亦大发其光矣！”⁶³所谓“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甚为关键，它所意味的是，随着学科知识逐渐成长，围绕此进行“专史”书写，也构成重塑“中国历史”的方向。⁶⁴

职是之故，被“解放”的，就不仅是史学，清理其他学科的资源同样可以借鉴此方式。这里的意味是，晚清士人由西方分科观念获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并致力于将中国传统资源纳入此中进行证明。换言之，历史范围的拓展，是由于接受了对史学新的认知，这既反映在书写内容的拓展，也体现在对史学学科地位新的认识上。刘师培1905年发表的《周末学术史序》，就将此问题显露出来。按照刘之自诩，此书之作，乃“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并且解释说：“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之体，拟以学为主。义主分析，故稍变前人著作之体也”。岂止是“稍有别矣”，“以学为主”的结果，是依照西学分类的方式重新梳理中国学术，所列序目包括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学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⁶⁵。这样的分科之论，或有可商之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立足各学科的“学科史”名目繁多；并且，在诸多学科中，“史学”反而不复存在了。这也部分解释了何以各种词典中较少标明为“历史学科”的“新名词”或“新术语”。

反映在对“史学”的认知上，即意味着确立了“系统化”的观念。针对来自日本方面史

版社1983年，页650-52。

61 沈兆玮：《新学书目提要》，上海通雅书局1903年，引文见《历史类总叙》卷二，页1。

62 陈怀：《学术思想史之评论》，《新世界学报》第9号（壬寅第9期），1902年12月30日，页2。

63 宋恕：《粹化学堂办法》，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页380。

64 按照周予同的看法，中国史学体裁上的所谓“通史”包含两种意义，一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接触后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见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前引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页513-73。这方面具体的讨论参见章清《重塑“中国历史”——学科意识的提升与“专门史”的书写》，《学术月刊》第8、9期，上海，2008年8、9月，页124-30，121-31。

65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总序》，《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2月23日，页5。该文续刊于2-4期。

著的解读，就突出了这方面的意味。王国维《重刻支那通史序》就这样写道：“所贵于读史者，非特考得失、鉴成败而已，又将博究夫其时之政治、风俗、学术，以知一群之智愚、贫富、强弱之所由然”。为此也强调：“近百年来，民智日进，新理日出，承学之士，持今世之识，以读古书，故其所作提要钩元，而于政治、风俗、学术之间，尤三致意”⁶⁶。东文学社在《申报》上刊登的“告白”，即指明中国历代通史若《通鉴》、《纲目》之类的著作，往往“卷帙繁重，不便记诵”，后世之“删节之书”，“则又多脱略，编定鲜识，致典章沿制皆不可考”。为此也表彰《支那通史》一书，“体例精善，于历代政令、风俗、建制沿革，考证详核，洵为至美至善之作”⁶⁷。在为樊炳清（1877-1929）译《东洋史要》所作序中，王国维还进一步指出：

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⁶⁸

不仅王国维有这样的看法，其他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了市村瓚次郎（1864-1947）著《支那史要》一书，担任翻译工作的陈毅（1873-？）就肯定此书，“叙录我国自开辟以迄今代数千年来政治上变迁之大纲，提要钩元，不烦不漏，至于学术风俗之有关政治上者，亦择要著论，更附各表，以便参照，其有便初学，岂浅鲜哉”⁶⁹。金为重译桑原鹭藏著《东洋史要》，也说明该书致力于“演绎其间种族之衰亡，邦家之废兴，巍然而与西洋史相班，划然而干世界史之半者也”。并且在《凡例》介绍说：“是编于文化、国粹、民气、种界数端，与内訾、召侮、迷信、柔靡诸弊，并极注意，恒详哉言之”⁷⁰。

汪荣宝（1878-1933）编《史学概论》也持有这样的看法，过去的史学，“不过撮录自国数千年来之故实，以之应用于劝善惩恶之教育，务使幼稚者读之而得模拟先哲之真似而已”，“未能完成其为科学之形体”。在其看来，“历史者，记录过去现在人间社会之陈迹者也，人间社会为最复杂之现象，故历史有种种之方面，若政治，若法律，若宗教，若产业，若学术技能，无一非人间社会之产物，即无一非历史之要素”。为此也阐明，“就此众多之方面与不完全之形体，而予以科学的研究，寻其统系而冀以发挥其真相者，是今日所谓史学者之目的

66 王国维：《重刻支那通史序》，见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上海东文学社1899年，页1。

67 东文学社启：《支那通史》，《申报》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1899年7月1日），页5。随后，《申报》还刊登一篇短文，表彰此书“为帙者只五，而于我国上下数千载治乱理忽，提纲挈领，简而能赅，诚足为乙部之津梁，而于《通考》、《通典》、《通志》外别开生面者也。”见《书〈支那通史〉后》，《申报》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四日（1899年9月18日），页3。

68 王国维：《东洋史要序》，桑原鹭藏著《东洋史要》，樊炳清译，上海东文学社1899年，页1。东文学社在《申报》上也刊登了《新译〈支那通史〉〈东洋史要〉》的告白，除肯定《支那通史》“体例精善”，同时介绍《东洋史要》一书，“于亚洲各国由上古迄现在政治、教育、风俗、交涉各大政，备载无遗，约而得要，洵为教科善本”。见《申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1900年2月9日），页5。

69 陈毅：《支那史要序》，市村瓚次郎著《支那史要》，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页1。

70 桑原鹭藏著：《东洋史要》，金为译，卷一，“总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页1；“凡例”，页3。

也，史学之大价值实在于此⁷¹。其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批评中国之“旧史”，“事实散漫，略无系统，可以为史料，不可以为历史”。相应地也强调：

历史之要义在于钩稽人类之陈迹，以发见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晚近历史之得渐成为科学者，其道由此⁷²。

基于“系统”、“科学”理解“史学”，既配合着各分科知识在中国的确立，也与“社会”的成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关键在于，所谓“系统”的“史学”，往往体现在通过政治、文化、宗教、学术数端呈现“历史”。针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蒋维乔（1873-1958）编《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有这样的看法，一方面肯定该书“注重我国文学、风俗、农、工、商等之进化，深得历史教育之本旨”，“实为近今初等历史教科书最新之善本”，对此的批评即是指出“是书不及完全系统，究与历史谈不同，似为迁就定章不得已而作者”⁷³。

以“社会”为中心编纂历史教科书，首先体现在“西洋历史教科书”方面。针对广智书局出版的《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论者就有这样的评价：

历史定义，在研究社会人类之进化，故泰西史家，凡有著述，必以关系社会人类之进化为标准。吾辈之读西史，注重在此，而今日之译西史，亦当持此意旨，以定取舍。

正是有这样的看法，作者因此也说明，“吾国自有翻译西籍以来，西史寥寥，而可充中学堂用，已辑为教科书者，不可得”，而反复搜罗，商务印书馆所出《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为最佳，其次则广智书局所出《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原因无他，“惟能依据历史之定义耳”，言下之意，是否立足于“社会”编写历史教科书已成为取舍的标准⁷⁴。对照上述两书，确实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如商务印书馆1909年所出傅岳棻（1878-1951）编纂的《西洋历史教科书》，在“叙例”部分就突出了这层意思：“历史者，所以叙述人群、国家、世界渐化致治之陈迹也，抑所以叙述往古人群、国家、世界渐化致治之陈迹，而牖现今人群、国家、世界渐化致治之新机也”。内中还特别提到所谓“通例”：“盖历史定义，以考究社会人类进化为主要，故西史通例，叙述人物事实，亦必以关系社会人类进化为标准”⁷⁵。

书写历史“话语”之转向，于兹也有充分体现，并通过“新名词”之“入史”展现出来。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即确立了这样的“视野”。《凡例》就表示：

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今

71 汪荣宝：《史学概论》第一节“序论”，《译书汇编》第2年第9期，1902年12月10日，页105-06。

72 汪荣宝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原原本朝史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叙论，页1。

73 《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教育杂志》第1年第2期，1909年3月16日，“介绍批评”，页6。

74 《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教育杂志》第1年第6期，1909年7月12日，“介绍批评”，页18。

75 傅岳棻编纂、庄俞校订：《西洋历史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叙例”，页1；卷一，页5。广智书局1908年所出为坪井九马三著，吴渊民译述《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

所编各课，其用意则与旧史稍殊。其注意之处约有数端，试述之如左：一、历代政体之异同。二、种族分合之始末。三、制度改革之大纲。四、社会进化之阶级。五、学术进退之大势。⁷⁶

既如此，对于文字颇为看重的刘师培，也广泛采用“新名词”。仅以章节目录而言，便不难发现诸如“政治”、“宗教”、“权利”、“义务”、“财政”、“工艺”、“美术”等“新名词”，而且不少与学科有关。⁷⁷夏曾佑之书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特点，述及“历史之益”即强调：

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如《大易》然），至完密之政治（如《周礼》然），至纯粹之伦理（如孔教然），⁷⁸灿然大备。

其他历史教科书，也展现了这一特点。1908年文明书局出版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其“编辑趣意”开宗明义，指出“史之例凡五”，分别为“政治史”、“文明史”、“世界史”、“分国史”、“国别史”。尽管说明“本编取第五例者也”，但同时又说明：“本编叙事，注意之端凡八：一国势，二风俗，三社会，四制度，五族制，六政制，七人才，八学术，皆分条详述，逐代钩稽，而联之使成一贯”。⁷⁹商务印书馆1909年出版的陈庆年（1862-1929）编纂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批评以往之史著，“于世界之思想，无所鉴观”，突出了“知识”的重要：“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完全知识之器械也”。并强调符合这一标准的，“日本所为东洋诸史，庶几其近之欤，桑原鹭藏之书，尤号佳构”。⁸⁰

这样的历史书写方式，也得到学部的认可。《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暂用书目》列有两种历史教科书，一为《乡土历史》（标明“无书”，原因在于，既然讲乡土历史，则“各地异书，无可通用之本”），一为文明书局《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二册）。对此有这样的评价：“今日国史教科绝少合初等小学程度者，是编于进化之理，尚有发明，故录存之”。⁸¹《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则通过了两种历史教科书，均为文明书局本，所列“附说”也显示“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在当时的“共识”。针对《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二册）就有这样的评说：“凡五编五十五章，于历代大势洞见无遗，旁及于学艺、宗教、文化、美术，与

76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刘申叔遗书》下册，页2177。

77 如第一册之第12、13课为“古代之政治”（上下），第19课为“古代之宗教”。第二册第5至7课为“西周之政体”，具体分为“一天子权利义务”、“二封建制度”、“三臣民之权利义务”。此外第8课“西周阶级制度”、第9课“地方自治制度”，第12课“西周之宗教”，第18、19课“西周之财政”（上下）。第三册第31课“西周之工艺”，第35课“西周之美术”。

78 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最新中学教科书）第1册，第一篇第一章第五节“历史之益”，页7。

79 章焱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1908年，“编辑趣意”，页1-2。

80 陈庆年：《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序》，见陈庆年编纂《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序”，页2。到民国时期，这一特点也延续下来。中华书局所出《历史教科书》也说明：“编辑历史之宗旨，人各不同。本书于民权消长民族盛衰之点，最加注意，故精神面目，与他种历史教科书，迥乎不侔。且我国国体，已成共和，凡历朝政治，关于一姓一家之存亡者，更不能不爬罗剔抉，以供学者之研究，故本书于专制政治之缺点，尤三致意”。见潘武编辑、刘法曾参订《历史教科书》，中华书局1913年，“编辑大意”，页1-2。

81 《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暂用书目》，学部1906年，页6。

历代夷夏之盛衰，尤饶兴趣，非撮拾故事者比⁸²。对于《蒙学西洋历史教科书》(二册)，也说明该书“四篇十二章，取材行文颇有调理”。同时对于外国名称之疏漏有所批评：“虽曰外国之名词不能尽确，然一课中多所抵牾，不可谓非疏也⁸³”。

来自报章的言论对此也有所说明，以此作为“历史教育”的基本方针。《大公报》刊载的一篇《论各学科之价值及其教授之方法》针对“历史”学科即有这样的解读：“历史之价值，在明社会之关系，养成其健全爱国心，与发其普通之道德观念也”。并强调：其一，“历史贵按年代而行，讲解时必用追年的顺进法。然不可以编年为课本，宜采传记体，择其事实及人物之主要者著于篇。此最易启活泼明了之知识也”。其二，“历史之中要注意文明史，其法在以过去之光辉照现今之社会。其材料宜多采农工商学术等事”。其三，“历史教授宜取近代之史事为主，现今社会与经济之问题，正难判决其难也⁸⁴”。北洋官报局编印之《学报汇编》，内收有日本学者所著《历史教授新法》，译者特别附识：

万物之因果在理化，人类之因果在历史。欲知现在，已过者是，欲知将来，现在者是。缩已过现在之枢纽，而达将来之希望者，舍历史其奚由？此科成立，距今才百余年，教者受者，皆以多识前言往行为得计，而于世界进化之原，社会发达之理，语焉不详，择焉不精，日本立柄教俊氏，所以有教授新法之作欤⁸⁵。

由此亦可看出，围绕“社会”的“系统”认识“历史”，也成为新的方向，相应的书写历史与其他学科知识高度结合，并广泛借助其他学科的“术语”，同样成为“新名词”之“入史”重要的一环。有意思的是，尽管这已成为历史书写显示的新气象，但史家对此似乎还并不满意，对于历史教科书的检讨往往也集中于此。黄现璠(1899-1982)对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调查，分出三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二年”为第一期——“帝王政治叙述时期”，指出历时12年所出版的教科书，约13部，皆偏重于政治。第二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为“社会文化叙述时期”，特别指出：“我国自民国以来，欧风东渐，极其勇猛，历史学家，始改变旧观，抛弃偏重政治的态度，注重社会文化方面”。言下之意，主要反映在受欧风之影响，乃“注重社会文化，就法律、学术、道德、宗教、风俗、民生等而研究之⁸⁶”。实际上，对“社会”的重视并非始于这一时期，倒是所展示的愈益重视“社会文化”的趋向，确算实情。程国璋(1898-1935)曾选择清末民初出版的五种历史教科书进行评说，也指明有下列缺点：(1)“选择事实太无标准了，太繁杂冗乱了”；(2)“文化史太少了”；(3)“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太缺乏了”；(4)“各期选择材料的多寡太不合宜了⁸⁷”。

82 《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学部1906年，页2。

83 《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学部1906年，页4-5。

84 古愚：《论各学科之价值及其教授之方法》(再续)，《大公报》1910年4月14日，第3版。

85 《历史教授新法》，北洋官报局编印《学报汇编》甲编，北洋官报局1906年，页1。

86 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与批评》，《师大月刊》第5期，北京师范大学，1933年7月，页81。

87 程国璋：《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法》，《史地丛刊》第2卷第2、3期，1923年2月，页1-14。

三、围绕“新名词”的争辩

王国维 1905 年撰写的《论新学语之输入》，注意到接受新知所带来的言语上的变化：“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王对此的分析没有陷入简单的赞同与批评，对于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王的意见是“两者皆非也”。原因在于：“夫普通文字之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而且，“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⁸⁸。“新名词”频频出现于汉语中，引发诸多争议已为研究者所重视。略为勾画历史书写中“新名词”的呈现方式，进一步要说明的是，历史书写中出现的“新名词”，或曰对于中国历史新的表述方式，引起怎样的分歧。

问题之所以引起高度关注，最基本的还在于，书写历史于中国来说，向于“文字”有严格的要求。刘师培《文说》“记事篇第二”即强调“简要详博”、“不杂芜词”乃“记事之文”的特点所在，还具体说明：“古人以事为主，凡记事必以文；后人以文为主，或因文以害义。故古事因文而传，近事因文而晦，以文胜质，此之谓乎。是以文苑之英，词林之秀，必参观古籍，博览群书，参互考验，穷流溯源，斯能出语有章，立言不朽。若征材聚事，徒供獭祭之需，恐摘句寻章，不越虫雕之技，以此言文，不亦误乎”⁸⁹。在《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序例》中也阐明这样的看法，“文学基于小学，彰彰明矣”，其不揣固陋，编辑国文教科书，也“首明小学，以为析字之基。庶古代六书之教普及于国民，此则区区保存国学之意也”。该书第一课也题作“论解字为作文之基”⁹¹。刘师培绝非孤立的例证。“立言”向被作为“三不朽”之一，则可以想见“做文章”于古人来说，确算得上很“严重”的事。高凤谦（1869-1936）就注意到：“今之所谓新名词，大抵出于翻译，或径用东邻之成语，其扞格不通者，诚不可胜数”，然而，却不能因噎废食，弃之不用，“后起之事物既为古之所无，势不能无以名之；此正新名词之所由起，固不必来自外国而始得谓之新也”。他还表示，“世界交通，文明互换，外来之事物苟有益于我国者，既不能拒绝之”，又何必“计较于区区之名词”。甚至强调：

平心言之，新名词之不可通者，勿用可也；既已习用，必从而禁之，不可也。治古学者不用新名词，可也；必以责通常之人，不可也。且谋教育之普及，不能不设学堂，学堂不能不教科学，教科学不能不用新名词。⁹²

88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第 96 号，1905 年 4 月，页 1-5。

89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尤其是第三章“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对日语借词之反应”，页 285-320。

90 刘师培：《文说》“记事篇第二”，《刘申叔遗书》上册，页 702-703。

91 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序例》，《刘申叔遗书》下册，页 2117。

92 高凤谦：《论保存国粹》，《教育杂志》第 1 年第 7 期，1909 年 8 月 10 日，页 547-48。

这里言及“治古学者不用新名词，可也”，正值得重视，“史学”即可归到此列，因此，“史学”中出现“新名词”，引发激烈争辩，也不难理解。关键在于，“史学”中出现的“新名词”，往往是基于“西史”分析中国历史与社会，是将中国纳入“普遍历史”的产物，也是认同西方价值具有“普遍性”的体现。此外，历史书写中出现的“新名词”引发诸多争论，重要的还在于“中史”构成斯时所流行的“中体西用”论的关键所在。⁹³

在制订各学堂章程之际，张之洞就表达了对此的看法：

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韩昌黎云‘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今日尤切。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⁹⁴

对于文字改革的声音，张也是有所保留的，每利用机会表达对此的看法，“近来新学输入，转译较难。而浅学者，每谓中国文字不足以用，创为废文字、立字母、用拼音之法，以求语言文字合而为一。推其流极，将见文字既随方音而变，而方音又随字母而变，势必咫尺之地，文字不通，岂非大乱之道哉？”⁹⁵后来张之洞参与制订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对如何坚守“中体西用”之原则，使办学“端正趋向”，严拒一切“邪说诡词”，也成为内中之“学务纲要”关注的要点。其中有两条内容，均与“文辞”有关：其一，“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其二，“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为此也强调“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并且说明：

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此后官私文牍，一切著述，均宜留心检点，切勿任意效颦，有乖文体，且徒贻外人姗笑。如课本、日记、考试文卷内，有此等字样，定从摒弃。⁹⁶

晚晴士人对此也发出了不少质疑之声。1902年2月邓实（1877-1951）、黄节（1873-

93 这方面张之洞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在《劝学篇》“循序第七”即曾明言：“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在“守约第八”中，则强调了“史学考治乱典制”的作用：“史学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实，一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世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见张之洞《劝学篇》，《张之洞全集》，第12册，“循序第七”，页9724-25；“守约第八”，页9729。相关的讨论可参见章清《“中体西用”论与中西学术交流——略论“体用”之辩的学科史意义》，收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页209-53。

94 张之洞：《致京张治秋尚书》，《张之洞全集》第11册，页8743-45。

95 张之洞：《致东亚同文书院根津》，《张之洞全集》第11册，页9630-31。

96 内中描绘了令人忧虑的现象：“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网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此等字样，不胜枚举，可以类推”。《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篇》，日本学术振兴会1972年，页215-17。

1935) 等人在上海创办《政艺通报》，即表达了对语言文字的高度重视。邓实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海市既开，风潮震撼，吾国不学之士、无良之民，浸淫于蟹行之书，病祖国言之深邃，反欲尽举祖宗相传以来美丽风华光明正大之语言文字废之而不用，而一惟东西之言文是依，以为夷其言语文字即足以智民而强国”。为此，他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一社会之内，必有其一种之语言文字焉，以为其社会之元质，而为其人民精神之所寄，以自立一国”。尤其说明“文言者，吾国所以立国之精神而当宝之以为国粹者也。灭其国粹，是不啻自灭其国”。“今之灭人国也，不过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臭，不战而已堙人国圯人种矣，此欧美列强所以多灭国之新法也⁹⁷”。1905年创刊的《国粹学报》，也延续了这样的看法。黄节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英俄灭印度裂波兰，亦“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并且说明日本影响如何逐渐渗透进来：“甲午创后，骇于日本，复以其同文地遂情洽，而收效为速也。日本遂夺泰西之席而为吾之师，则其继尤慕日本。呜呼，亡吾国学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⁹⁸相应的鲜明表达对时下流行的“东瀛文体”的排拒：“本报撰述，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渊懿精实，一洗近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⁹⁹。刘师培也将日本文体的输入中国，视作“中国文学之厄”：

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其始也，译书撰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夫东籍之文，冗芜空衍，无文法之可言，乃时势所趋，相习成风，而前贤之文派，无复识其源流。谓非中国文学之厄欤？¹⁰⁰

对“新名词”持最严厉批评立场的，大概要算彭文祖的《盲人瞎马之新名词》，单就书名来看已鲜明表达了对“新名词”的立场。张步先在《序》中还大体描绘了其中之成因，以及问题的严重性：“凡治其国之学，必先治其文。顾吾国人之谈新学也有年矣，非惟不受新学之赐，并吾国固有之文章语言，亦几随之而晦。试观现代出版各书，无论其为译述也，著作也，其中佶屈聱牙、解人难索之时髦语比比皆是。呜呼，是何故耶！是不治外国文之过也，或治之而未深求也。盲谈瞎吹，以讹传讹”¹⁰¹。不惟将“新名词”与“新学”结合在一起，尤其还将此作为对“新人物”之讥讽。该书首篇“新名词”即据此立论，指出凡此种种，皆为“不知新名词之为鬼为祟，害国殃民，以启亡国亡种之兆”：

我国新名词之起源，于甲午大创以后，方渐涌于耳鼓，此留学生与所谓新人物（如现大文豪梁启超等）者，共建之一大纪念物也。旧人物，见之退避三舍，欣欣向新者，望洋而叹，不

97 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页173-74。

98 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2月23日，页2。

99 内中还指明：“我国旧有之载籍卷帙浩繁，编纂极艰，故无一成书者，坊间所有多译自东文，夫以本国之学术事实，而反求之译本，其疏略可知，其可耻孰甚”。见《国粹学报略例》，《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2月23日，页1。

100 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国粹学报》第26期，1907年3月4日，页4。

101 张步先：《序文》，见彭文祖《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东京秀光社1915年，序文，页1-3。

知其奥蕴如何深邃，于是乎新名词日进无疆。欢迎者，恨不能兼夜研之；嫌恶者，恨不能入土骂之。因此新人物、老腐败之名起，终日笔战汹汹，大有不相两立之势。¹⁰²

这里重点要说明的是“新名词”之“入史”引出的争辩。日本因素的作用，不仅展现于大量的翻译著作，也体现在对中国学者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而且，直至五四时期，历史教科书仍“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¹⁰³。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也是事出有因。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颁布后，各省“多以课本应用何书为问”，因此“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组织编就《京师大学堂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刊发各省”。其中“中外史学”部分，教材及参考书，均包含大量的日本出版物及翻译于日本者¹⁰⁴。1902年担任京师大学堂教习的王舟瑶（1856-1925），在编写《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时也坦陈：“中国旧史，病在于繁，不适时用”，反倒是“日人新编，较为简要，且多新识”，“皆足备览”¹⁰⁵。

开办新式教育使“教科书”构成“生意”，推动着编译工作的展开，并引出“新名词”的话题。具体到历史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的秦瑞玠编著《高等小学西洋历史教科书》，即已道出：“西史全系译本，人地事物，各种专名，歧出不一，近更有由日本转译，而一新其名词者”¹⁰⁶。同年由丁保书编写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更有这样的认知：

顾近岁以来，各学堂多借东邦编述之本，若《支那通史》、若《东洋史要》，以充本国历史科之数。夫以彼人之口吻，述吾国之历史，于彼我之间，抑扬不免失当。吾率取其书用之，勿

102 彭文祖：《盲人瞎马之新名词》，页3-4。书中对当时流行的“新名词”，提出59个例证逐一进行质疑。

103 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17-23日，第4版。

104 其中“中外史学”列出的“教材”包括：《史鉴节要便览》（6卷本，鲍东里辑，武昌局刻本）、《读史镜古编》（32卷，潘世恩辑，飞霞阁刊本）、《普通新历史》（1册，上海普通学书室本）、《支那史要》（6卷附图1册，市村瓚次郎著，陈毅译，广智书局本）、《支那通史》（4卷，那珂通世编著，上海东文学社本）、《最近支那史》（4册，河野通之、石村贞一著，上海振东室本）、《世界近世史》（1册，作新社译本）、《东洋史要》（4卷，桑原鹭藏著，樊炳清译，东文学社本）、《西洋史要》（2卷附图1册，小川银次郎著，樊炳清、萨端同译，上海金粟斋本）、《节本泰西新史揽要》（8卷，李提摩太译，周庆云节录，梦坡室刻本）、《欧罗巴通史》（4册，箕作元八、峰山米造合纂，徐有成、胡景伊、唐人杰同译，上海东亚译书会本）、《亚美利加洲通史》（2册，戴彬编译，商务印书馆本）、《东洋历史地图》（1册，石泽发身辑，日本宏文馆本）、《历代地理沿革图》（1卷，广东冯氏重刻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1册）、《支那疆域沿革图》（1册附略说1册，重野安绎、河田黑合辑，日本富山局本）。“参考书”为：《钦定二十四史》（五局合刻本）、《资治通鉴》（294卷，武昌局刻本）、《通鉴目录》（30卷，武昌局刻本）、《通鉴外纪》（10卷，武昌局刻本）、《续资治通鉴》（220卷，武昌局刻本）、《明通鉴》（200卷，武昌局刻本）、《历代帝王表》（3卷，文选楼本）、《历代职官表》（65卷）、《历代地理志韵编今译》、《万国史纲目》（8卷，重野安绎著，日本东京劝学会刻本）、《日本国志》（40卷首1卷，广东刻本）、《西洋历史教科书》（2卷，商务印书馆本）、《南阿新建国史》（2册，福本诚著，陈志祥译，文明书局本）。参见《京师大学堂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四月湖广督署重刊，页1、9-11。

105 所提及的包括：桑原鹭藏《东洋史要》，田中萃一郎《东邦近世史》，市村瓚次郎、泷川龟太郎《支那史》，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河野通之、石村贞一《最近支那史》，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见《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贰编”，“论读史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年，页2-3。

106 秦瑞玠编著：《高等小学西洋历史教科书》，“编辑大意”，页2。

论程级之不审，而客观认作主位，令吾国民遂不兴其历史之观念，忘其祖国所自来，可惧孰甚。窃不自量，编成此册，以我国人述我国事，如以孙子述父祖之德行。凡予族姓，庶闻而兴起，念厥先缔造之不易，而以护恤保存，为人人应尽之义务乎！¹⁰⁷

《东方杂志》创刊号上介绍商务出版的姚祖义编纂《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今各省兴学，学科中无不列历史”，可兹“教授”用之“历史课本”，近年以来也陆续出版，“然大都取自日本成书点窜一二以为之，颇有伤于国民之感情，谈教育者时以为憾”。相应的也强调“是书出自吾国人之手，一切去取，无所偏弊”，尤其体现在“措词得体，绝无时下嚣张之习”，“用诸学堂，尤为合理”¹⁰⁸。前面提到的黄现璠对历史教科书的调查，对于第一期出版的13部教科书，也持这样的看法：“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崧《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且最大错误者，是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¹⁰⁹。

对于“教科书”的编写，清政府也颇为重视。按照《学务纲要》的要求，“于各省各设学务处一所”，“由督抚选派通晓教育之员总理全省学务，并派讲求教育之正绅，参议学务”。可以说，“学务处”在推行新式教育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就包括对教科书的审定，“择其宗旨纯正，说理明显，繁简合法，善于措词，合于讲授之用者”¹¹⁰。宋恕任职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文案时，即负有“将府州县各等学堂教科书从速审定”之责，“强忍寒疾，夜以继昼，不敢稍涉粗疏，致负宪委”¹¹¹。宋恕对“日本因素”倒并不排斥，其所拟《粹化学堂办法》就建议“学课”宜分“华文、日文两课”，“讲授四部宜兼用日文书”，甚至认为：“‘藏书楼’三字连用之新名词亦不通之俗译也。日本译为‘图书馆’，当矣！”还发出这样的感叹：“盖今华人识字之浅于日人远矣！”¹¹²因此，在其对教科书进行审定时，并未就“新名词”多加注意，而是对历史教科书犯有“大不敬”之内容，尤为注意，拟出《请通飭禁购三种历史教科书禀》¹¹³。而《吴守呈禀及附件批文》也特别说明：

上海新出编译各书，宗旨极杂。其中历史一门，最多趋重民族主义，甚或显露革命排满之逆意。司学务者，若不逐卷细检，徒见其书名尚无违碍之字样，遽取以列于教科，则学堂之中必将隐行逆说，朝局危机，将伏于是。¹¹⁴

107 丁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编辑大意”，页1。

108 《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东方杂志》第1卷第1号，1904年3月11日，“新书介绍”，页256。

109 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与批评》，《师大月刊》第5期，北京师范大学，1933年7月，页75。

110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篇》，页221。

111 宋恕：《审定初小教科书禀》，1905年11月11日，《宋恕集》上册，页392。

112 宋恕：《粹化学堂办法》，1905年11月15日，《宋恕集》上册，页377-90。

113 在其所审定的35种教科书中，特别提出“三种历史教科书皆犯大不敬，理合揭明”。原因在于，此三种教科书，“皆直书我太祖庙讳，肆无忌惮，乃至此极，按之律例，实属大不敬之尤。方今孙文逆党到处煽乱，此种大不敬之教科书实亦暗助其势力，若不从严禁购，何以隐销逆萌”。见宋恕《请通飭禁购三种历史教科书禀》，《宋恕集》上册，第390-91。

114 《吴守呈禀及附件批文》，1905年12月4日，《宋恕集》上册，页393-94。从“批文”亦可看出，地方

1907年2月湖南学务公所开办，皮锡瑞（1850-1908）受聘为图书课长，主要职责也是审订湖南各学堂所编讲义。透过其留下的日记，可略知此项工作之繁重。往往一天需要“批阅”讲义十本，甚至二十本。而审查之重点，则是讲义是否符合学部所颁发之“宗旨”。该年3月20日的日记就写道：“阅经学、修身学，所讲颇有思想，而宗旨不正。已签出批驳，将呈学使视之”¹¹⁵。皮锡瑞也是颇为看重“文章之道”的，读了戴鸿慈（1853-1910）《出使九国日记》，在日记中就留下这样的话：“美总校长言法取他国，仍须勿忘本原，中国以文章著于世界，当保存之；怀特君亦云然。即东人国粹之说”¹¹⁶。正是基于此，对于讲义中的文字，皮也有“新名词拉杂多至不可数”的感叹¹¹⁷。不过对于历史教科书中的问题，皮倒并没有更多言及。日记中提到《支那开化史》，也只是表示：“《支那开化史》略翻阅，似亦可用，仍宜增定”¹¹⁸。

对于当时各自编写教科书的方式，皮锡瑞并不看好。于商务所出教科书，就有这样的看法：“到公所，见商务印书局以书四十种请审定。其书实无可，皆由上不颁教科之过也”¹¹⁹。在其1907年上湖南学政吴庆坻（1848-1924）书中，也阐述了“教科诸书宜颁定”的主张：

考日本学堂教科书，皆由文部审定颁行，是以整齐划一。今学堂林立，教科尚未颁行，教员人自为书，家自为说，新旧异趣，高下殊途，每换一人，则教法不同，甚或全然反对，生徒莫知所从，以致师弟冲突。其所沿用之教科书，乃日本人及留学生所编辑，宗旨既不尽合，教授殊不相宜。教员之学问稍深者，犹能择取其长，自编讲义；其学问不深者，但知钞录原文，一字不易，师以此教，弟子以此学，近日学生离经畔道，皆由此等教科书有以启之。即有提学认真调查讲义，而讲义由教科书出，不清其源，终不能绝其流。¹²⁰

山东、湖南的“学务”工作，是普遍的情形，《申报》1908年刊载的《江督饬司审订教科书》一则消息也透露出相似的一幕。内中强调了，“小学教科书一事，总以文义浅显，宗旨纯正为主”，正是基于此，对于某局所编写的初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第一节太古汉族”，就有这样的批评：“汉族意义，即外人称吾国人为秦人、唐人之例，小学学生断不能领会此说”，尤其是，“不善讲解者，且甚至举满汉为解释，如此教学岂非歧之又歧”¹²¹。

此一时期留学日本的钱玄同（1887-1939），也提供了值得检讨的例证。钱1905年底赴

官对此也希望能实现“开智”与“防祸”的目标，内中就写道：“邪说之界说无定，而逆说之界说有定。即男女平等、官民分权等说，中国士大夫尚多目为邪说，而在英、德、日本等国，则共以为堂堂正正之正说”。为此也强调：“该守务须善体本总理等开智、防祸双管齐下之苦衷，时时切囑各学堂教员、管理员等，于中国诸子百家之异谈及西来、东来一切之新议论，除革命排满之逆说必当严禁外，其余皆不妨任令学生研究发挥，以畅其天机而绝其愤郁之源，是本总理等所相期于该守者矣！”

115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丁未年二月初六日”，页372-73。

116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6册，“丁未年九月廿三日”，页451。

117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6册，“丁未年九月廿六日”，页453。

118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6册，“丁未年十二月廿八日”，页481。

119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6册，“丁未年九月二十日”，页451。

120 皮名振：《皮鹿门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页101。

121 《江督饬司审订教科书》，《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8年12月21日），页11。

日留学，对于此时频频出现的“新名词”当有不少接触。一开始也并非全是负面的评价，1906年2月20日的日记就写道：“阅任公《太平洋歌》，直可当历史歌读，以记事之笔，作瑰奇之文，而又以种种新名词填入其中，而仍浑存自然，毫无堆砌之痕，真才子笔也¹²²”。不过，很快的对于新名词似乎就失去了好感。该年5月4日的日记中谈到曾鲲化所著《中国历史》，就留下这样的评价：“曾氏之《中国历史》，体例未错，而喜用新名词，太远国风，且考据多讹，恨矣¹²³”。在其自编年谱中，对此还念念不忘：“平心而论，历史教科佳者，首推夏氏，次则刘氏。若曾氏者，专专用新名词，并照图像，不率故常，实极可笑¹²⁴”。而孙诒让（1848-1908）1907年也提出“译教科书宜统一名词”的问题：“新学大兴，译述外国教科书，繁如烟海。凡中国文所有之名词，自宜概用中文；惟外国人名、地名，则宜用西文译音”，“各科学中国向未发明者，亦多用译音”。在他看来，“应请大部审正音纽，垂为定名，而附注异同于下方，勒成一书，颁行天下，俾各校悉用定名教授，庶可斟酌划一，以省纷互¹²⁵”。《申报》1906年刊发的《学务刍言》，针对“改良学务”也特别提出“审查图书”的重要性：

自学堂兴办后，操觚之士，雷动而蜂湧，其译者以输入文明为言，其编者以导率后进自任。而吾读其书，则纯驳不一。有昌言适用于何校而程度不能符合者；有摭拾仅三四十课而教授不敷一年者，大都书贾谋利，心计极工。树国民之标识，达营业之目的，盖什之七焉。凌乱错杂，厥害宁鲜¹²⁶。

在此前后，针对教科书的审定即不乏这方面的内容。官方针对文明书局的一件批复就表示：“欲治西学，必精西文；欲译新书，必深旧学；不读周秦两汉之书而能通欧亚两洲之驿者，无是理也。近来译本风行，日新月异，大都后生初学稗贩东邻。朝习和文，夕矜译译，求合于信达雅之旨者，百不见一”。肯定文明书局在这方面的示范作用，为此也批示：

嗣后文明书局所出各书，无论编辑译述，准其随时送候审定，由本大学堂加盖审定图章，分别咨行，严禁翻印，以为苦心编译者劝。该局益当详慎从事，惠兹学界¹²⁷。

科举废除后成立的“学部”，更是介入到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中。1906年8月创办的《学部官报》，作为学部的机关刊物，体现的是官方对“学务”的管理，强调此举乃“刊发公告以辅行政之机关”，并要求“发交各省提学使转发各学堂一律阅看”，以使“在学之人有所遵循，不至自为风气”。《学部官报》第3期起，专设“审定书目”栏，说明“本部因学堂急

122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1906年2月20日”，页59。

123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1卷，“1906年5月4日”，页130。

124 钱玄同：《钱德潜先生年谱稿》，《钱玄同日记》第12卷，“附录二”，页7554。

125 孙诒让：《学务枝议》，见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页479。

126 《学务刍言》（续），《申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八日（1906年10月25日），页2。

127 《钦命（管理、会同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吏、刑）部尚书张荣批》（1903年），此据汪承镛编《国史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1905年，封底。

128 《奏编录官报片》，《学部官报》第4期，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页57。

需，故拟审定暂用之本，凡有自著教科书者，准其呈请审定。如属合用，自当揭登本部官报，或汇齐刊列书目，通行各省¹²⁹。后来的一篇文章还阐明了学部对教科书审查工作的定位：

各省呈请审定教科书籍，良楛错出，纯驳不齐，皆经派员悉心钩校，取其胚胎经史与阐发各种科学而不背畔道德者，准予锱板鬻行，以裨教授。其有蔑礼敦教，稍涉奇衰，如平权之赘说，种族之誓言，自由结婚之歌辞，惑世诬民之报纸，凡若此类，业已节次通飭严禁发行各在案，断不任其混乱人心，贻误来学。¹³⁰

对于学部审定教科书的工作，郑鹤声（1901-89）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有所评说，指出当时对教科书的流弊，学部的报告约有以下数端：“一曰事多假设不能证实；二曰杂立名词无复抉择；三曰方言讹误不便通行；四曰文意艰深索解不易；五曰卮言异说惑乱人心¹³¹”。内中显示出，对于教科书中涉及政治方面的“语汇”，往往遭到批驳。1908年浙江出版的何琪编《初等女子小学国文教科书》，即因为“取材有平等字样，学部认为不合，下令查禁¹³²”。可略加说明的是，对“教科书”的审定，“日本名词”、“东文语气”等环节也成为重点所在。如《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暂用书目》中，针对商务所出《学校管理法》就指出：“书中沿日本名词，我国有不通行者，如出席、迟参之类。讹字尤多，重印时当校改¹³³”。而从“学部官报”的“审定书目”栏更是可以了解到，因为同样的原因遭受“批驳”的所在多有。

《学部官报》的“审定书目”栏，汇集了学部审定教科书的意见。第13期所审定的书目中，两种都因为“日本因素”而遭批驳，或者指为“夹杂东文语气”，或者以其“俱系日本人说法¹³⁴”。第17期针对江楚编译官书局呈送《日本历史》等书，又有这样的批复：“查《日本历史》，叙述尚少误谬，惟各学堂不能以日本史为独立科目，且该书纯沿日人语气，碍难审定¹³⁵”。第31期针对浙江巡抚咨送高等学堂讲义及乡土教科书，学部则有这样的回复：“《教育原理心理学》浅显便于教授，惟征引间有未确，纂言间有鄙俚之处，且多沿日本人语气，似是抄译东籍而未及改正者。《西洋历史讲义》译辑东籍而成，其取材不外元良氏《万国史纲》与长泽氏《万国历史》，而空语太多，译名亦有前后违异处，自系随教，未定之本¹³⁶”。

129 《咨鄂督转飭武昌府令亚新铜版地图局速行登报申明冒名本部审定字样文》，《学部官报》第13期，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审定书目”，页15。

130 《覆陈直督陈夔龙奏时局陆危敬陈管见折》，《学部官报》第129期，宣统二年七月十一日，“本部奏章”，页4。

131 郑鹤声：《三十年来中央政府对于编审教科图书之检讨》，《教育杂志》第25卷7期，1935年7月4日，页23。

132 《教科书之发刊概况》，《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开明书局1934年，“戊编”，页123。

133 《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暂用书目》，学部1906年，页12。

134 《北洋警察毕业生丁永铸呈书三种请审定稟批》、《江苏试用直隶州知州郑完成呈译书二十二种请审定稟批》，《学部官报》第13期，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审定书目”，页16、17。

135 《咨覆江楚编译官书局呈书六种均毋庸审定文》，《学部官报》第17期，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一日，“审定书目”，页18。

136 《咨覆浙抚所送高等学堂讲义改正后再呈审定，定海教科书无庸审定文》，《学部官报》第31期，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审定书目”，页41。

针对其他讲义，也有类似的批评。对余维涛所呈《自然地理学》，“学部”的批复即直指其“用语”皆“多沿东译”，未能掩其“捃摭之迹”¹³⁷。对四川提学使送呈速成师范讲义诸书，也有类似的批语：“《行政法大意》为日本行政法之大要，条理简明，译述亦能达意，惟语气有直译处，须酌改。《经济学大意》大体已具，而沿用东文语气及日本名辞，于吾国人读之殊不便，为酌易一二，不能尽改也。书中所引西儒学说处，其人名悉用假名译音，亦为易以汉字”。说明“以上两书均须修改润色，乃可作为中学参考之用”¹³⁸。对于商务呈送的《和文汉译读本》，更直接说明“毋庸审定”：

该书系日本寻常小学国语读本，译者以为便吾国人学和文之用，故每卷附有译文，然以所译汉文与和文对勘，闲字尚多，且有不成语处。¹³⁹

《学部官报》第 57 期公布了《本部审定中学所用书目表》，其中与历史相关的包括《历代史略》(8 册，中新书局)、《中国历史》(2 册，陈庆年纂)、《本朝史讲义》(2 册，京师译学馆本)、《东洋历史》(2 册，商务)、《万国历史》(3 卷，作新社编译)、《西洋史要》(2 册，金粟斋)、《西洋课程》(3 册，山西大学堂编本)、《万国史纲》(1 册，商务)，还列出相关书籍的“提要”¹⁴⁰。由第 60 期刊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校勘表》则不难发现，对于教科书中的日本痕迹，着力予以删改。如涉及时代划分的“上古期”、“中古期”等均改作“上古史”、“中古史”等。第 61 期又登有《万国历史教授细目》和《万国历史校勘表》，删除了不少“敏感”性的语词，如“以固人民之自由及平等之权利”，注明“二句删”；与“革命”相关者，要么删除，要么改“大革命”为“大乱”，“革命党”为“新党”，“革命时代”改为“旧学改革时代”。有的改动还加上“评语”予以说明，如“司巴达人精神至使为之不怠”一句，就加上这样的“评语”：“此等不可训之语虽系纪，亦以不用为是”¹⁴¹。

正是因为对此的重视，学部在这方面也有所努力。张之洞入主学部后，即于 1909 年设立了“编订名词馆”，致力于“统一文典，昭示来兹”，负责规范教科书中的“术语”。约半年后即奏称：“编订名词馆自上年奏设以来，于算学一门已编笔算及几何、代数三项；博物

137 内中写道：“该书分编叙述，尚无大谬，惟所举例证率以日本为主，而地名、国名等亦多沿东译，如独逸露西亚之类，且第三编盛称岛国之特色，张皇过甚。此等处盖皆由移译而来，未能掩其捃摭之迹，于国民教育之旨，颇不相符。”《生员余维涛呈自著自然地理学请审定禀批》，《学部官报》第 25 期，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审定书目”，页 37。

138 《札覆四川提学使前送师范讲义可作参考无庸审定文》，《学部官报》第 95 期，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审定书目”，页 1。同期还刊有对《民法原论》一书的批复：“译笔亦能达意，惟文气语句直袭自日本处多，阅之殊苦费力。法律用语诚不可轻为更易，至词句之间，但期不背法理与其条文之原意，固未尝不可使改而从我，以便读者。除签出各条外，应大加改正，并俟下卷续出后再行统呈审定可也”。《王双岐呈民法原论请审定禀批》，《学部官报》第 95 期，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审定书目”，页 2。

139 《商务印书馆经理候选道夏瑞芳呈地质学各书请审定批》，《学部官报》第 107 期，宣统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审定书目”，页 2。

140 《本部审定中学所用书目表》，《学部官报》第 57 期，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审定书目”，页 2-4。

141 《中国历史教科书校勘表》，《学部官报》第 60 期，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书目审定”，页 1-16。

142 《万国历史校勘表》，《学部官报》第 61 期，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审定书目”，页 6-9。

一门已编生理及草木等项；理化、史学、地学、教育、法政各门已编物理、化学、历史、舆地及心理、宪法等项。凡已编者，预计本年四月可成，未编者，仍当挨次续办¹⁴³。到1910年“学部”又奏称“各种学科中外名词对照表”年底可以告竣。“学部”所致力的工作，也起到示范作用，黄摩西所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即强调该书之编纂，“一切学语以学部鉴定者为主，余则取通行最广者”¹⁴⁵。其时“适领名词馆于学部”的严复，也欣然为该书写序，指明该书之编纂，“其所以饷馈学界，裨补教育，与所以助成法治之美者，岂鲜也哉？”¹⁴⁶

余 论

“新名词”对中国历史的重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梁启超1923年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再版自记”中，对此有所总结：“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¹⁴⁷。略说晚清时期“新名词”之“入史”所产生的影响，还有必要对后续的发展略加补充，实际上延伸到民国时期才凸显出其问题所在。由于过度关注这些新词的“政治意味”，或贴上“东瀛文体”的标签，清季对此的反省显然是不够的。以这样的方式重塑中国的“过去”是否合适，到民国时期才堪称有所检讨。

可以明确的是，“变革”的基调是贯穿清季民国的主题，影响所及，“新名词”、“新术语”也可谓层出不穷；学界热衷编纂各种辞书、词典，就揭示出这一特质。1923年出版的《新文化辞书》就阐明：“我国近年来的新文化运动，把我国人底知识欲望提高了”，并说明在这样一个“分科的时代”该书采集的范围：“关于政治、宗教、经济、法律、社会、哲学、文艺、美术、心理、伦理、教育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凡是和新文化有关系而为我人所必需的知识，和对于各方面有重大贡献的学者底传记及其学说，兼收并采，分条叙述”¹⁴⁸。1929年出版的《新术语辞典》一书也持相似的看法：“我国自五四运动以后，不断地介绍欧美的学术进来，因此，读者阅读书报时，就常常碰到许多的‘新术语’。说明该书即因应这样的情况，“选择在一般的读者所最常见的属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社会心理、社会问题、社会思想、社会运动、哲学、文学、欧洲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等的‘新术语’以及我国自己所有的流行的新术语”¹⁴⁹。从各种词典收词的情况看，同样鲜少标明“历史学科”的术语，与之前所发生的情况颇为相似。1934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小辞典》，所收内容包括“中

143 《学部奏陈第二年下届筹办预备立宪成绩折》，《教育杂志》第2卷第5期，1910年6月16日，页31-32。

144 《奏预备立宪第三年上届筹办事宜折》，《浙江教育官报》第42期，1910年11月16日，页270。

145 《凡例》，黄摩西编撰《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凡例”，页1。

146 严复：《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序》，黄摩西编撰《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第1册，页1。

147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民国丛书”第4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再版自记”，页13。

148 唐敬果：《新文化辞书叙言》，《新文化辞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页1-2。

149 吴念慈、柯伯年、王慎名编：《新术语辞典》，上海新文艺书店1929年，“编辑凡例”，页1。

国历史上的国名、朝代名、种族名、官爵名、制度名、史部名著、重大事件、专门术语等”，也未曾涉及与“社会”相关的术语。¹⁵⁰不过，这其中值得重视的转变也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重塑中国的“过去”是否合适，到民国时期也有所检讨。

围绕“历史”学科的种种“术语”即有诸多争论。1923年钱玄同针对西语之中译，就仍有改“意译”为“音译”的主张，原因即在于，“照原字的意义译成中国字，译得不确当固然不对，即使译得极确当，也还是不对，因为无论如何总是隔膜了一层”。相应的，其不仅更接受“不能算做翻译”的“音译”，还以此阐述其所持“用罗马字母作国语字母”的主张：

中国人要希望与世界文化融合而不再受隔膜的苦痛，除了用罗马字母作国语字母，实在没有更适宜的办法。国语用了罗马字母拼音，则西洋字的输入，真如“水之就下”，顺便无比：“论理学”自然写 Logic，……“伦理学”也自然写 Ethics。¹⁵¹

1926年傅斯年在与顾颉刚（1893-1980）讨论古史的信函中，更是提出用“新名词”指称“旧事物”是否合适的问题：“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信中亦提及：“‘史’之成一观念，是很后来的。章实斋说六经皆史，实在是把后来的名词、后来的观念，加到古人的物事上而齐之，等于说‘六经皆理学’一样的不通”。进而还说明：“我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思想一个名词也以少用为是。盖汉朝人的东西多半可说思想了，而晚周的东西总应该说是方术¹⁵²”。在给胡适的信中，傅也道出古代中国严格说来“没有哲学”而只有“方术”，他也舍弃“哲学”一词不用，而只用历史性的“方术”一词，“用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名词是当时有的，不是洋货”，乃“他们自己称自己的名词”，反之，如“把后一时期，或别个民族的名词及方式来解他，不是割理，便是添加¹⁵³”。

可以说，对于“新名词”之“入史”，给中国历史贴上新的标签，一直都有批评的声音。

150 周木斋：《中国历史小辞典》，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凡例”，无页码。

151 钱玄同：《林玉堂〈国语罗马字拼音与科学方法〉附记》，《晨报副刊》1923年9月12日，第3-4版。

152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457-459。由此，也可以理解傅何以会反对使用“哲学”一词。在《战国子家叙论》中，即阐述了这样的意思：“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西洋哲学即印度日耳曼语言之副产品”，“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在其看来，就语言层面来看，“哲学”断难在中国发生，“是很自然的”。“拿诸子名家理学各题目与希腊和西洋近代哲学各题目比，不相干者如彼之多，相干者如此之少，则知汉土思想中原无严意的斐洛苏非一科”。因此，“为什么我们反去借来一个不相干的名词，加在些不相干的古代中国人身上呀？”见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傅斯年全集》（二），页251-55。

153 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8日，收入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页357。直至今日，在国际学界仍在提出中国有无“哲学”的争辩。见Carine Defoort。“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Arguments of an Implicit Debat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51, No. 3, Eighth 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 (Jul. 2001), pp. 393-413。中国方面对此的回应可参见葛兆光《穿一件尺寸不合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开放时代》2001年第11期，页49-55。

本文一开始提及的胡适与梁漱溟的争辩，不过是其中之一例，是伴随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我国的成长所引发的新一轮争辩。胡适的言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或许显得有些“曲高和寡”，但就史家对此的讨论来看，不少都有类似胡适那样的困惑。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中，傅斯年就致力于说明“历史教科书和各种自然科学教科书之不同处”。自然科学“可以拿大原则概括无限的引申事实”，然而，“在历史几不适用”。尤其说明史家“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是史论不是史学，是一家之言不是客观知识了”。“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因此，傅所设想的是，“我们对于历史事件，虽不能作抽象的概括命题，却可以根据某种观点，作严密的选择。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件多得无数，既不容归纳，只得选择了”。¹⁵⁴邓之诚（1887-1960）撰写《中华二千年史》，也发表了这样的感想：“尝见今人所谓历史教科书，每以今时之文字叙述古事，甚或以白话文行之。……以今时之文，纪古时之事，其不中程，亦犹之乎以古时之文，纪今时之事也”。在其看来，“史贵求真，苟文字改易，将必去真愈远”，故此，“求真之义不磨，则原文似不当改”。¹⁵⁵钱穆（1895-1990）撰写《国史大纲》，对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士所提倡的“革新派”之史学，也多有批评，指出“近人率好言中国为‘封建社会’，不知其意何居？”并将此归于“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¹⁵⁶在别的地方，钱也叹息于“帝王专制与封建社会之两语，乃成为中国史之主要纲领”，并表示：“试问何以在封建社会之上尤得有专制政治。近人必以西方史学来治中国史，则恐终难理解矣”。¹⁵⁷

与之相应的，对此的检讨还引出以“新名词”理解历史是否造成严重隔阂的看法。“新名词”之所以频频“入史”，是因为不断产生的重新认识中国“过去”的需求，因此，能否守护“历史的维度”，并恪守此延续历史的记忆，也成为问题的关键。所谓“历史的维度”，无非是强调“证释古事者”，当注意其“时代限制”。¹⁵⁸陈寅恪（1890-1969）诠释“了解之同情”的治史取向，所论最为详尽。在为冯友兰（1895-1990）《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审查报告”中，陈就强调，“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然实际情形却是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在陈看来，这样的哲学史，“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¹⁵⁹这段常被征引的话，自有其深意在，所涉及的乃纵横古今之间的历史学的自处之道。不过，这样的见解算不上是什么“新见”，涉及古今问题的论述历代都不乏相似见解者。¹⁶⁰同样是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审查报告，金岳霖（1895-1984）就提出，“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我国的哲学史呢？”与之相应的

154 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1日，页99-112。

155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叙录”，页7-8。

156 钱穆：《国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引论”，页3-4。

157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序”，页5；页124。

158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167。

159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页279-81。

160 对此详细的分析可参见罗志田《陈寅恪史料解读与学术表述臆解》，收其所著《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75-200。

也涉及两个基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有这样的批评，指出该书乃“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颇多牵强附会之“成见”，而且书中所流露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¹⁶¹。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何以会发生“新名词”的情形。

“新名词”之“入史”，构成清季民国引入瞩目的现象，其影响是多面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由于“新名词”之“入史”，乃中西历史“合和”的产物，因此，不仅涉及史学编纂的问题，将中西历史纳入到相同的时间序列中，其意义也不限于史学。将中国纳入“普遍历史”，究其实质，实际是认同西方社会的演进代表着人类“普遍”的发展模式，还以此作为中国历史演进的未来。尤可虑及的是，对此的反省，尽管也时有流露，但毕竟是微弱的。

严复与章太炎围绕《社会通论》产生之歧义，即与此有密切关联。严复接受甄克思(Edward Jenks, 1861-1939)提出的“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认为“此其为序之信，若天之四时，若人身之童少壮老，期有迟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还推断中国社会也是由宗法而渐入军国，“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¹⁶²。严复通过译述《社会通论》表达的对社会演进的理解，也曾激起热烈回响，章太炎却提出了不同看法，“甄氏之意，在援引历史，得其指归。然所徵乃止赤、黑野人之近事，与欧、美、亚西古今之成迹，其自天山以东，中国、日本、蒙古、满洲之法，不及致详，盖未尽经验之能事者”。指明甄氏之书“不足以悬断齐州之事”，“皮传其说”的严复并不了解中国¹⁶³。章太炎对严复的质疑，可看作是对“普遍历史”之抗拒，非一时之见，章也据此批评过其他人。1906年章出狱后在东京发表演说，就针对斯时流行的“欧化主义”表达了不安，指出其所秉持的，“并不像做‘格致古微’的人，将中国同欧洲的事，牵强附会起来；又不像公羊学派的人，说什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¹⁶⁴。这里所讥斥的，就包括主张“西学源出中国说”的王仁俊(1866-1913)，以及以“三世”仰攀“进化论”的康有为(1858-1927)。稍后，他还直指康，“好举异域成事，转以比拟，情异即以为诬，情同即以为是”。这种枉顾中西历史差别，强行将中西纳入所谓“类例”，“何其迂阔而远于物情耶？”¹⁶⁵

类似于章太炎这样的反思，在五四时期也曾演出相似的一幕。在“尊西”与“趋新”成为主导价值的五四，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颇不寻常。梁在书中强调文化的发展有一定律则(即所谓的“没尽的意欲”)，并据此提出一套理论架构，认为西方文化、印

161 金岳霖：《审查报告二》，见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附录，文页5-6。

162 严复：《译〈社会通论〉自序》，《严复集》第1册，页135-36；《〈社会通论〉按语》，《严复集》第4册，页923。

163 在章看来，“社会之学，与言质学者殊科”，涉及自然科学之问题，“验之彼土者然，即验于此土者亦无不然。”因此，“若夫心能流行，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断可知矣！”见章太炎《〈社会通论〉商兑》，《章太炎全集》第4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322-37。

164 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页1。

165 章太炎：《信史上》，《章太炎全集》第4集，页64。

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各有不同的特点及成因。耐人寻味的是，文章一开始曾述及胡适对于“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的批评，然而，这里所显示的是，胡适也是认同于“普遍历史”的。梁氏对文化差异性的辨析，即遭到胡适的反驳，在胡那里，各民族文化所表现的，“不过是环境与时间的关系”，如以历史眼光观察文化，“只看见各民族都在那‘生活的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¹⁶⁶。显然，胡适将东西文化归于历史步调的差异，认同的即是“普遍历史”与进步理念。因此，胡认为梁的理论太过笼统，秉承的却是将世界历史纳入一个类型更笼统的看法，难怪梁也予以有力反驳，“胡先生说我笼统，说我不该拿三方很复杂的文化纳入三个简单公式里去；他却比我更笼统，他却拿世界种种之不同的文化纳入一个简单式子里去！”¹⁶⁷

不能说章太炎、梁漱溟等的看法乃“空谷足音”，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当我们试图去了解构成20世纪中国历史书写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很容易就会聚焦于“普遍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成长，尤其是以“五种社会形态”描绘中国的历史进程，即是将中国纳入“普遍历史”模式的结果。“五种社会形态”，显然就不只包含时间概念，还隐含着历史演化是有着深远意义的过程。即使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也同样是在“普遍历史”的架构里进行阐述。或许可以说，“历史的终结”，于此有了实质的意味。如何伟亚（James L. Hevia）所揭示的，中国思想家重新审视中国的过去，主要体现在接受时间观念和分类，并运用“西方”新话语解释中国之“落后”，这些“与从前存在于中国的任何治史方法完全不同”¹⁶⁸。而如何超越“在中国发行历史”，走通“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仍然是史家需要面对的问题。¹⁶⁹

尤有甚者，史学的“政治化”及“意识形态化”，也足兹反省。钱穆对“革新派”史学的检讨就道出，“其治史为其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然而，“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其结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智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案。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智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¹⁷⁰。诚哉斯言！“政治”与“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历史书写，更是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基调。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上，即贯穿着这样的主旨。中华书局1913年所出《历史

166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书杂志》第8期，1923年4月1日，无页码。此为《努力周报》的增刊。

167 梁漱溟：《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陈政记，《晨报副刊》1923年11月16日，第2版。

168 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页250。

169 参见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页107-12；《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页22-40。

170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页3-4。

教科书》即阐明：“编辑历史之宗旨，人各不同”。言下之意，过去的历史教科书，“本其专制国民之眼光，于民族民主民生三大主义，每多背违。前清之季，教科书晚出，号曰革新，然仍不免斯弊”。为此也强调：“本书于民权消长民族盛衰之点，最加注意，故精神面目，与他种历史教科书，迥乎不侔。且我国国体，已成共和，凡历朝政治，关于一姓一家之存亡者，更不能不爬罗剔抉，以供学者之研究，故本书于专制政治之缺点，尤三致意¹⁷¹”。配合着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政治形势，商务所出《新时代历史教科书》，开宗明义，“历史教科书，本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精神，凡历史上重要事实，如中外民族的盛衰，君权民权的消长，人民生活和文化进退，采取编述¹⁷²”。而在“国难”背景下，杨东莼（1900-79）编著《高中本国史》述及“本书目标”，则有如是之言：“叙述中华民族的拓展，与历代文化政治社会的变迁，以说明本国现状的由来；同时注重近代外交失败的经过及政治经济诸问题的起源，以说明本国国民革命的背景，指示今后中华民族应有的努力¹⁷³”。此亦说明历史书写高度配合政治的演进，“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基调”左右着历史书写的“基调”。关乎此，德里克（Arif Dirlik）在其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著作中已颇有洞见地指出：“20世纪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在与中国社会的革命化进程的辩证关系中逐步发展。世纪之交，由新的政治需要产生了一种新的对于社会的意识，进而开始了寻求‘新史学’的进程”。“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预言，只要革命的问题继续，历史的问题也仍将继续下去¹⁷⁴”。相关讨论不是这里可以展开的，当撰诸另文。

171 潘武编辑、刘法曾参订：《历史教科书》，上海中华书局1913年，“编辑大意”，页1-2。

172 傅林一编、王云五校：《新时代历史教科书》，注明“大学院审定”，“小学校高级用”，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新时代高小历史教科书编辑大意”，封2页。

173 《例言》，杨东莼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页1。

174 德里克著：《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212、217。